

翻译理论与人地关系

许建忠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市, 300191)

摘要: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 作为人类文明的翻译活动必将与其发生密切关系。不同的地域产生了世界上五彩缤纷的语言文化, 那么作为传播语言文化活动的翻译理论研究必将打上其地域的烙印, 如目的论产生于德国, 翻译变体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生态学理论产生于中国等。不同地理环境下孕育的翻译及其研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色, 所以某一译论在异地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 如多元系统论在中国。另外, 某一译论引进到异地, 也会受到异地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从而产生误读现象, 如韦努蒂的“foreignizing”同中国本土的“异化”。因此在引进外国译论时, 应该批判的加以接受。只有融合外国译论和中国传统译论, 并同中国的具体翻译实践相结合, 才能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译论。

关键词: 翻译理论 人地关系 地域色彩 误读 水土不服

中图分类号: H059

1. 引言

人地关系论, 即有关人类及其各种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理论, 是指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有关人地关系的思想和学说。人地关系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 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人地关系理论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翻译是人类的一项古老的活动, 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 而语言和文化又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的, 这就为我们探讨翻译与人地关系创造了前提。

既然人地是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系统, 那么反应人地关系的翻译理论也难免例外。世界上的翻译理论都是在其特定的人地关系中产生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翻译理论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特点。例如, 德国可以说就是功能学派的中心地带, 以色列、低地国家可以说是多元系统论学派的中心地带。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流派和女权主义翻译流派无疑也有着各自相对活跃的中心地带。因此, 一个区域的译论流派有着大体的共同特征, 如俄国的文艺学派、美国的语言学派(包括结构学派和交际理论学派等)、美国的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的释意理论等。

限于篇幅, 我们在这里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加以剖析, 以便说明问题。

2. 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国译论

胡庚申教授的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从“适应”、“选择”的视角来探讨翻译理论问题, 是对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尝试。它借用其它临近学科领域相关的研究思路, 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 揭示和描述了译文产生的翻译过程, 目的是试图构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该论的基本理念表述如下: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 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计结果; 对于译者, 适者生存、发展; 对于译文, 适者生存、生效。该论对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该论的译评标准: 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 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胡庚申, 2004)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在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下诞生的, 既充分反映了中国人追求自然的倾向, 同时也顺应了地理学中的适应论。

许建忠教授的《翻译生态学》是一部翻译学与生态学相互渗透的产物。该书紧紧围绕翻译生态这一主题，从翻译与其生态环境之关系入手，以翻译系统为主线，以生态体系为横断面，建立起全书纵横交织的整体结构和框架，科学、客观地阐释了翻译生态学的内涵以及翻译存在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全面、深入地揭示出翻译生态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阐述了翻译生态的演进、翻译行为生态及其评估标准，并提出实现翻译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本书以翻译学和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旨在建立翻译生态学这一崭新学科。（许建忠，2009）翻译生态学理论，是在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下诞生的，它顺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在中西方译论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创新译论。该理论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同时也顺应了地理学中的生态论。

3. 目的论为什么会出现于德国？

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翻译观，是20世纪70年代末，继语言学派形式主义的翻译观以后，综合了众多学科，吸收了多种来源而形成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翻译学派。它注重功能主义与社会文化因素，注意吸收和借鉴交际学理论、行为理论、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理论，以及文学研究中侧重于读者和读者接受与反应的理论等，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理论流派。那么这一理论为什么会出现于德国呢？下面就从其人地关系谈起。

德国是欧洲的几个主要大国之一，他的版图就位于欧洲大陆中央。单从这两点，我们就不难看出德国在欧洲事物上的重要性。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当德国还仅仅是300多个小联邦聚集的一个地理概念，而非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时，德国的一举一动就引起着整个欧洲的关注。

德国位于欧洲的中部，地形从北到南分坦荡如底的平原、中等不高的山脉和白雪皑皑、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这是一块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的沃土。原始森林、清彻溪流平原、山脉、巍峨壮伟的阿尔卑斯雪峰；向南望去，先是平坦的绿地，茂盛的森林，再是中部茵绿的山野，远处是蓝天艳阳下雪光闪闪的阿尔卑斯山，构成了一幅画卷。它陶冶人们的情怀，思想，启动人们对自然与社会本质的好奇与追索。德国的气候也较温和，它既有凉爽温和的夏天，也有寒而不严的冬天，这些为学者的静思冥想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种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利于德国人发展他们的才能。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促使了德国的民族性格、语言特点与思维习惯的形成。德国民族性格可概括为严谨、精准、朴实、理性。德语是世界上最富逻辑性的一门语言，它赋予德国人以天下无敌的逻辑思维能力。德语的语法规律很死板，性、数、格的规律十分严格，这造就了德国人严肃、一丝不苟、重视纪律的特点，也孕育了德国人进行严密、抽象思维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德语妨碍了德国人进行灵活多样、富于变化的小说、绘画创作。德国人天然地具有思辨力强，办事一丝不苟，勤劳认真等优点，这也就是德国人能在学术、思想、音乐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奥秘所在。

目的论之所以在德国产生，关键就在于在这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德国民族的学术精神、德国人极强的行动能力和关注效果与实现目的的倾向。

关于德国人的学术精神，首先要提到的是德国人的知识精英意识。这种知识精英意识，在精神上高居于一般普通大众之上，最求卓越与超绝，极端者追求超人和强力意志，许多人奉行终身的独身主义和牺牲精神，献身于事业和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使得德国哲学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征。其次是很强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形而上学传统。德国哲学家们一

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形而上学传统下各个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完成，和企图建立各门学科的形而上学以便回答只是何以可能的问题，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独立创造的精神和设计体系的能力，使不少学科的最初雏形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如冯特率先提出的民族心理学，为今天的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奠定了学科认识的基础，等等。

与上面两种倾向截然相反的是，德国人具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和关注效果与实现目的的倾向。这种行倾向影响着德国人对技术的苛求和鉴赏细节的习惯心理，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何以德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实力在某些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事实。

总之，除了超越社会与自我的强大内在驱动例外，一方面是哲学和思辨能力为创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技术和行为能力则进一步为知识找到了价值实现的途径和手段。甚至在社会能力方面，德国人的守纪律和善合作，也是理性思维和行动能力相协调的表现。所有这些，对于德国的学术思想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

如果说德国的精神追求是形而上学的和决定论的，那么这一民族的行动能力倾向则要求一种关注人的行为方式与人际关系的行动哲学。而行动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功能主义翻译观的基础，就是因为它已经纳入跨文化的交际模式之中，具有系统论的充足范围和目的论的要旨了。（王宏印，2008）

4. 翻译理论的水土不服现象

在某地，即在一特定人地关系中产生的翻译理论，当其被引进到另一地时，往往会发生水土不服的现象。也就是说，不同地理环境下孕育的翻译及其研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色。

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著名学者 Evan-Zohar 提出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认为，从文学史上看，翻译文学既占据过“主要地位”，也占据过“次要地位”，一个民族的文学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地位，或起主要作用，或起次要作用。而翻译文学的不同文化地位反过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根据多元系统论，如果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从而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的翻译方法(domestication)；而如果翻译文学在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翻译方法(foreignization)。这种涉及主流翻译策略的取向在世界一些地区，尤其是以色列，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以色列是个新兴国家，其国民同外国文化的联系又是那么密切，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对自己的文化很难有认同感，他们不得不通过翻译向更为强大的文化学习，通过翻译不仅向以色列年轻的文化引入新思想，而且也引入形形色色的形式和体裁。因此，其翻译策略采用的是异化法。但用多元系统论的这一论断来解释中国的翻译现象就会出现一些不同步现象。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其中除第二次高潮以引进西方的科技为主外，其它三次都主要为文学翻译。第一次翻译高潮（146-1111）中，佛经翻译的由始到盛，正是中国文化逐渐强大至鼎盛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翻译也经历了由异化到归化的历程，这与多元系统论的论断是相吻合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时期（1840-1930s），尽管中国当时的文化地位在客观上是处于劣势，但长期以来，国人无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文化中心，中央大国、文化霸主的意识在当时根深蒂固。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体验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滋味，决意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道，但仍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面对已经落后的文化地位，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调”。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同一文化背景下，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策略取向，即翻译策略是异化和归化共存。第四次翻译高潮始于文革结束后，情况

同第三次高潮大致相当。后两次高潮所出现的异化归化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是多元系统论无法解释的。

显然，由于多元系统论未考虑译者的文化态度，即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略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其无法解释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些情况。其实，多元系统假设的始作俑者 Evan-Zohar 的理论局限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理论视野主要局限在他所关心的文化体系（即有其地域性），中国文化显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可以说，多元系统论对文学外的，特别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因素，是故意忽略的。Toury 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个方便的批评讨论题目，部分原因是“它避开了任何有关国歌或《圣经》翻译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的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忌讳”（Toury 1995: 169-170）。Feldman 曾有如下揣测：“我觉得，他们是害怕以色列的现实中无处不在、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以才感到科学这个比喻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理性和客观的错觉，无疑一道极其需要的屏障，用来挡开以色列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Feldman 1985:34）。

5. 翻译理论被误读的情况

某地产生的翻译理论，在被引进到另一地区时，往往会受到被引进地的人地关系中所产生的理论的干扰，产生误读现象，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误读。现仅举其中一例：

异化 ≠ foreignizing

汉语“异化”与 foreignizing 渊源不同。1983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收录了“异化”词条。“异化”作为哲学概念创始于黑格尔，继承于费尔巴哈，完成于马克思；德语译名于 1963 年传入中国，其英语名称 alienation 译自德语 Entfremdung。foreignizing 是韦努蒂在 1995 年出版的《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提出的术语。“异化”与 foreignizing 在体现异质性的具体方式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是源语取向的常规翻译方法，通过模仿原作传达外国文本特有的语言形式和文化特质。后者涉及翻译选材；既不向作者也不向译者靠拢，是一种翻译实验，侧重再创造和在选题或语言表达上偏离译语文化常规，构建不和谐的译文文本。中国学者外译汉时，倡导异化是为了学习西方文化；韦努蒂提倡“译入英语时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in English），目的是遏制英美文化中的种族中心主义，提高译者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国内的论争纯粹是翻译方法层面的，而韦努蒂的动机却是文化和政治的。（贺显斌，2005： 45-56）纵观国内的翻译研究，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国内早就存在“归化”一词，认为是韦努蒂创造的术语。但在使用时，却沿用中国“归化”的意思。

6. 结语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与地球这种最古老的关系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源泉。不同地域产生不同的语言文化，同时也产生了具有地域色彩的翻译理论。因此，从地理学角度探索翻译，可谓理所当然。本文尝试从地理学角度探讨翻译理论问题，试图就翻译理论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探求和剖析，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翻译理论与人地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既然翻译理论因地而生，那当然要打上其地域色彩和烙印。这就要求人们在研究和使用的某一地域的翻译理论时，要特别注意其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也就是说，不能盲目照搬而应批判性的予以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 Feldman, Yeal S. 1985. Poetics and Politics: Israeli Literary Criticism between East and Wes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9-35.
- 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贺显斌, 2005, 《论权力关系对翻译的操控》, 厦门大学出版社。
- 胡庚申, 2004, 《翻译适应选择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王宏印, 2008, 《传承与超越: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序; 见卞建华, 《传承与超越: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许建忠, 2009, 《翻译生态学》, 中国三峡出版社。
- 周尚意、孔翔、朱竑, 2005, 文化地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Translation and Man-land Relationship

Xu Jianz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The earth is the home of human being, so as one of the human activities, transl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s living environment. Different regions produce a variet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 translation theory, as a means of disseminat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is bound to be stamped with the brand of its specific region. Therefore, we should accept the international theories critically. Only by grafting the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n our Chinese traditions,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our translation practice could we bring forth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man-land relationship; regional features;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in translation; disagreeing with a new environment